

# 孙中山送给宋庆龄不寻常的结婚礼物

编者按：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何大章编著的《宋庆龄往事》一书，本书采用大量曝光图片与文字档案，揭秘尘封岁月中的往事，展现了宋庆龄的坚韧与温柔，魅力情怀与独特的美。以下为本书节选。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在婚礼上，孙中山送给新娘的礼物不是钻戒，不是耳环，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世俗首饰珠宝，它是一支手枪。孙中山说：“这枪配了二十颗子弹，十九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

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作为最重要的纪念品，宋庆龄终其一生都精心地收藏着这支手枪。

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筹备纪念宋庆龄的展览。秘书杜述周奉命到上海去接收一部分重要文物。在将这支枪带回北京时，根据当时的安全规定，他将二十发子弹交给上海市公安局。从此枪和子弹才分开。

展览布置好，廖承志来审查。见到这支手枪，他关切地问：“这枪的子弹呢？”由此可见，宋庆龄的这支枪在当时的革命者中十分著名，而且枪和子弹从来不开。革命者们对其是十分熟悉的。

在过去的记载中，这支枪被说成是勃朗宁手枪。我们就一直延续这个说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位到宋庆龄故居参观的外宾，认真地观察了这支枪。然后，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这枪不是勃朗宁的而是德国毛瑟的。我们这才注意到，枪身上标的的确是“毛瑟”(MAUSER)。

几十年来，这支枪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不仅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爱情的见证，也体现了宋庆龄为革命不畏艰险的精神。

2003年，我们到新加坡做巡回展览。一天，我在“财富之泉”举办讲座。当讲到这支枪时，一位听众突然站起来，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说的不对。1915年不可能有这样小巧的毛瑟枪。”我说：“但枪上的确刻着‘毛瑟’字样。”他说：“那就是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宋庆龄的那支枪。”我说：“这枪确实是宋庆龄的。我不是

枪械专家。我很感谢您关注这件事。希望您能帮我们证实。”那位先生说：“我会证实的。我会请枪械专家来鉴定，证明你们是错的。”

第二天我又在那里举办讲座。快要结束的时候。听众中站起一个人。正是昨天的那位先生。他当着所有的人向我赔礼道歉。原来，当天晚上他请了一位枪械专家来特意品鉴此枪，专家的证实结果是一——这支枪确是“毛瑟”，而且正是1914年最新出品的，但这种型号很不常见。这位先生不仅再三为他的“无礼”道歉，同时还将他专门复印的载有这支枪图样、数据的枪谱送给我。我深深地被他认真的态度所打动。

孙中山将一只毛瑟手枪作为送给新娘的礼物并不寻常，宋庆龄深味其意，并将其保存终生。一切一切，都体现出两位革命家不凡凡俗，献身理想的个性品格。

(孙琳)



孙中山送给宋庆龄不寻常的结婚礼物。

## 日本战俘为啥怀念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用以开展打倒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这就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由来。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供给，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的形势下，不仅有保障，而且相对于八路军总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生活更优越。

在抗日根据地，军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在1942年就作出了十分细化的生活供给标准制度，共分10类40余种。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列为第一类，日本战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来对待。如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对外宾客灶更是优先，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豆腐30斤、杂支每人每月50万元边币。奶费、灯油费、洗澡用炭均一一列出，按量供应，衣服不限。日本工农学校新来的学员，给予特殊优待：第一月份发给津贴5元，被毡按实际情况

补充，毛巾及肥皂各一条，牙刷一把，牙粉及烟各一包，旱烟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单衣单裤、衬衣衬裤各一套，鞋袜各一双。以后每隔四个月，每人补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条，肥皂两块，烟草二斤，鞋袜各一双。

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2.5市斤)，粮食除按我军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10斤(不扣米)，过年、过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后来改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两三个菜。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还有各类边区自产的白酒。

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干，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包不起来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过了一段时间，学员们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99%来自晋冀鲁豫各个战场，他们被俘后大都经过在前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初步教育及生活的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更是受到特别的关照。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八路军一二〇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〇师部竟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烫热泪。

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15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到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恐慌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真是大不一样。病愈后，我就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

有位学员叫谷川，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发表在校内墙报上。他在文章里写道：“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

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小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聂荣臻在回延安开会时，特意登上宝塔山视察日本工农学校。当他看到墙报的文章，学生谈到延安生活幸福，经常吃鸡素烧时，开玩笑地对负责总务的刘兴渭说：“能不能请我吃一顿鸡素烧啊？”刘兴渭说：“就怕司令员不肯赏光。”聂荣臻哈哈大笑说：“我一定放开肚皮吃一顿日本菜。”半小时后，学生吃晚餐了，聂荣臻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通过翻译和学员们谈话，食堂内不断传出学员们的笑声。

学员的津贴，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当时，八路军的津贴，分成五个等级：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朱德的津贴也是5元。学员的津贴3元钱，在当时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一般是用不完的。加上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宽裕。

1942年8月下旬，延安连续下大雨。有的地方爆发了山洪，部分灾民缺乏衣食。9月1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自动集资144元，支援灾民。《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件事，表扬学员们。

1943年，学员把集体剩余的5000元钱，投入学校的合作社。不少学员说：“在日本，我们欠了很多债，在延安，倒变成了投资者和有

钱人了。”

学员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出校门随意散步。不少人喜欢到商店去逛。

一次，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四位成员也赶来参加，他们坐在观众席，看日本师生演节目。这些由日本学员自编自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崎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特别是“收割的秋天”这出戏，反映日本农村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碾打，但在稻谷丰收后，自己却颗粒未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供给侵略战争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应山事件”话剧，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台上台下热浪涌滚。当那位名叫尚里的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都挥动拳头喊了起来：“干啊！干啊！”

文艺晚会在“八路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落下帷幕。美军观察组的一位成员受师生邀请讲话。他用不熟练的日语说：“真没想到，工农学校的学生在延安过着这样愉快的生活，连新来的日本士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与大家心连心，这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时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旧地重游……”

(据《人民政协报》)